

中國近代洋土體育論爭發軔期之演進 (1915~1924)

許光庶

摘 要

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而吸收其他文化長處以保存自我文化繁衍、傳承與特色，成爲各文化之重要課題。鑑於清末民初，是中西文化交流變動最劇烈的時代，而中國近代體育發展亦面臨重要抉擇，因此本文以西洋體育發展之淵源、本土體育興起之原因，綜論洋土體育論爭之內涵及影響，採歷史研究法透過資料的蒐集、分析、整理和批判，歸納下列結論：

一、西洋體育之傳入，以教會學校及基督教青年會影響最爲深遠，尤以青年會引進與宣揚西洋體育爲首功，透過青年會帶動體育團體組織的成立，而全國運動會的舉辦與遠東運動會的參賽，皆得助於青年會，後來植基中國近代西洋體育人才，大多出自青年會之栽培。

二、本土體育之興起，可歸因於中國近代企求強國強種之思想，又受西洋體育的衝擊，吸收西洋文化精華，並融合傳統文化爲宗旨，本土武術組織與教學方法皆隨時代變遷，加上官方與民間的提倡，本土體育煥發新的生命力，繼續傳承與繁衍。

三、綜論新舊與動靜體育之爭，皆在誇己之長貶他人之短；藉由論爭可瞭解本土體育以朝科學方向改進，在西洋體育的競爭刺激下，本土體育著手整理其內容，並試圖付與新意義；西洋體育在生搬硬抄的移植下，尙難適應中國文化特色與民族性。因此，吸收西洋體育之精華，並融會本土體育之文化特色，以發展有中國體育特色之道路，仍爲今後研究之課題。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ATHLETICS STRUGGLE BEGINNING IN CHINESE MODERN AGES (1915-1924)

ABSTRACT

Between the end of Ching-Dynasty and the init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the hardest era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ferring period.

Also it forced Chinese modern athletics to face the primary decis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s focusing on the origion of Western athletics development and the factors of Chinese athletics starting to summarize the Western athletics' struggle meanings and influences. Like historical study, through collection, analysis, organization and judgement of the informations, we conclude the following results.

I.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athletics into China was mainly derived from missionary schools and Christianity YMCA. In particular YMCA should be the most merited about circulating the Western athletics containing in its promotion to direct athletical organization setting up, to sponsor the National Sports Games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 Far East Sports Meeting. That is why those Chinese modern western athletical experts were majorly cultivated by YMCA.

II. Chinese athletics starting was owing to modern Chinese eagerness for strengthening a powerful country and citizens, together with the stimulation of western athletics. We absorb the western cultural essentials and combine with our traditional cultures to develop our own sports goals. Chinese fighting skills organiz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are evolved according to times transference. Besides, promotion by both government and folk peoples encouraged and renewed our Chinese athletics vigour and enthusiam.

III. To sum up the conflicts between new and, as well as between active and quiet athletics, it is nothing but only to boast of their own outstanding excellence and criticize others' defects. Based on those disputes, we learn that Chinese athletics is improved towards scientific target. Under competition and stimulation of Western sports, Chinese sports intended to rearrange the theme and organization. The Western athletics which was rigidly and inflexibly transmitted to China still cannot be followed up with Chinese cultur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our futural study theme should also be focused on absorbing western athletics merits and harmoniously blending ou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sports to create our own unique Chinese athletics style.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近百年來是中國文化變動最劇烈的時代，歷經洋務運動、百日維新、中體西用、君主立憲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註1），無不一再顯現中國在西方潮流的衝擊下，載沉載浮，四處飄蕩無所依歸的窘境。由於中西文化在源流和發展迥異，且中西文化曾於盛清短暫中斷一時（註2），而此時正值西方飛躍騰達的時刻，科學的昌明促進產業的升級，政治的革新推動產業與資本不斷向外擴張，在船堅砲利的掩護下，世界各落後地區成爲列強榨取的目標（註3）。

中西文化大規模交流始於戰爭，而中國在不得不爾的抗拒、排斥、吸收過程，經歷一段漫長的踟躕與掙扎。肇端於洋務運動，與體育素有淵源的兵操首先登陸（註4），而傳統的中國武術依舊有其軍事價值，因此呈現新、舊混雜陳；隨著戰爭、通商、傳教、留學等文化交流的擴展，且西洋體育在一片銳意圖強的西學聲中，一知半解的傳入中國；另有守舊的人士深信保存「國粹」的價值（註5），並刻意宏揚傳統中國武術於不墜。

世界各國文化交流更趨頻繁，且因彼此的誤解而頓生衝突。鑑於體育活動爲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世界各地區的體育活動交流，有助於相互瞭解其文化內涵與特色。清末民初，是中國受到西洋沖擊最劇

烈的時期，中西文化匯流激盪的浪花，更是壯觀。因此，本文之研究有助於本土與西洋文化之瞭解，並作為將來體育發展之借鏡，為本研究之動機。

二、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 (一)探討西洋體育在中國發展之淵源。
- (二)分析中國近代本土體育興起之原因。
- (三)綜論中國近代洋土體育論爭之內涵及影響。

三、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歷史研究法，將蒐集與本研究相關的史料，經過整理、研讀，再加以分析、歸納、詮釋、批判後，撰寫成本論文。

四、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範圍，時間是以1915年新文化運動起點，至1924年教育權之收回止，為中國近代洋土體育論爭之發軔期；空間是以當時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統轄地區為限；內容以政府或民間對洋土體育推展至學校、社會、軍中之發展情形，及其政策、目的、作為、觀念為範疇；對象以政府之教育或體育相關法規、報告、紀錄及民間發行之報紙、雜誌、刊物，並參酌當時對體育有影響之重要人物的言論、著述為領域。

五、研究限制

本文以文獻研究為主，因臺灣受主客、觀因素之影響，相關文獻史料有限，惟筆者前往大陸透過各種管道蒐集，在有限的時空條件下，倍嘗艱辛。另因，戰亂史料的佚失，加上「史觀」的差異，恐無法完全採客觀立場，分析、解釋歷史真象。

六、名詞解釋

- (一)「洋」體育：是指近代透過戰爭、通商、傳教、學校、留學等媒介由歐美（西洋）或日本傳入中國之田徑、體操、球類等體育活動。因此，本研究所指的「洋」或「西洋」體育是指近代由歐美傳入中

- 國之體育活動為主，以日本（東洋）傳入為輔，部份文獻稱「近代體育」。本研究除尊重原來引用文獻外，一律使用「洋」或「西洋」。
- (二)「土」體育：是指中國自古流傳下來的傳統體育，以中國武術（國術）為主，還包括導引氣功、踢毬、鞦韆、風箏、棋類等民俗體育活動。執此，「土」或「本土」體育是指西洋體育尚未傳入中國之前已在中國流傳之固有體育活動，部份文獻稱「傳統體育」。本研究除尊重原來引用文獻外，一概使用「土」或「本土」體育。
- (三)「洋」「土」體育論爭：本研究所指「洋」「土」體育論爭，是從1915年至1924年間有關「土」體育或「洋」體育的互相批評言論，均為本研究所稱「洋」「土」體育論爭。
- (四)文化：本研究所指文化包括規範的、認知的、藝術的、器用的各方面。不論是有形的書、繪畫、建築，無形的語言、信仰、習慣，以及作為生活規範的道德、宗教、禮儀、倫理等均為文化範疇（註6），是一個包含多層次、多方面內容的統一體系，文化主要包含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思想、意識、觀念等等。第二層次是組織、制度、風俗，是思想觀點凝結而成的條例、規矩或行為模式等。第三層次是器物，表現文化的實物或外顯的行為現象，如經人工科學技術改造過的物質（註7）。

貳、西洋體育之傳入

西方體育的傳入管道相當多，如西方列強在中國的駐軍，西方商人在華貿易，受聘擔任中國兵操教習等。另外，對西洋體育傳入影響最大的是教會學校、基督教青年會，及中國遣派出國習藝的歸國留學生，本節將以此三點做介紹。

一、教會學校與西洋體育

教會學校一般不開體育課，卻最早開展田徑、球類等運動。例如聖約翰在1890年就舉行以田徑賽為主的運動會，北京匯文書院和通州協和書院在1895年前後就開展棒球、牆球、網球、足球等運動，1896年籃球運動經天津青年會傳入京津一帶教會學校，1900年以後教會學校出現以田徑、球類為主要項目的校際運動（註8）。1906年協和書院在北京天安門與英國士兵足球比賽，當時清廷畏懼外國，正巧一位太官八人抬的大

轎路過，見中國人與英人踢球，非常驚奇，次日這位大官特備一個白磁九龍杯，派人送到英國公使館，將這個杯送給勝利隊，英公使館人員只得派人騎馬將九龍杯送到河北通縣協和書院。這場比賽協和書院以二比零勝英國駐軍（註9），成為中國隊勝外國球隊的先例。

早期教會學校對西洋體育在中國的傳播發揮重要的影響，由於教會學校開展體育較早，開風氣之先。且教會學校的運動較優，在運動競賽中常有某些倡導、示範、觀摩等作用。例如1913年在馬尼拉召開的第一屆遠東運動會上，中華田徑隊26名選手共得36分，其中來自聖約翰大學的5名選手就取得26分（註10）。教會學校體育在傳播西洋體育佔有重要地位，藉體育活動達到文化交流效果，展現西洋文化的不同風貌，並提高教會學校的聲譽，因而西方體育重勝利的功利色彩，也一併帶進中國。這種優勝劣敗的「選手制」和「錦標主義」形勢，對二十年後後的中國近代體育產生嚴重的弊病。

二、基督教青年會與西洋體育之發展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之正式組織，早在1885年福州的英華書院和通州的潞河書院先後成立青年會，是為肇端。1908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成立，始設體育部。青年會全國協會除體育部外除開展日常工作，還必須與其他各部協同，處理有關的事務。其他各部同樣也有推廣體育的義務，如幹事養成部不僅培訓能夠料理一般事務的幹事，而且培訓專門的體育幹事；學生部也要兼管各學校聯合組織運動競賽等事務。因此，從推廣體育來說，青年會是一個整體，而體育部只是其中一個重要部門（註11）。青年會自創設以來，其所推展的體育活動也逐漸豐富，對西洋近代體育引進中國，有多方面的作為和影響。

（一）宣傳西洋近代體育

1. 運動項目之引進與傳播

1913年奈史密斯博士親自創建最早的籃球隊中鋒蔡樂爾(C.A.Siler)來到中國（註12），1915年到1917年在他任天津青年會體育部主任期間專授籃球，併經常到京津各學校義務擔任指導和裁判。1915年第二屆遠東運動會和1917年第三屆遠東運動會，他任中國籃球隊指導，對中國早期籃球運動的傳播和推廣有重要貢獻。另有來會里(D.W.Lyon)對籃球運動指導與推廣有一定影響（註13）。在青年會的引進傳播之下，籃球運動在中國逐漸開展。

棒球的傳入是由於清政府於1872年派遣30名幼童赴美留學，在美國耶魯大學留學期間，詹天佑、梁敦彥、蔡紹基、黃天甲、陳鉅庸、鐘俊成、李桂攀、吳仲賢、鄭勇鐘等人組織中華棒球隊，經常與當地球隊進行比賽（註14）。這批留學生於1881年畢業回國，隨後從美國、日本歸國的華僑和留學生陸續將棒球運動帶回中國，後經教會學校、基督教青年會的提倡而逐步開展起來（註15）。

羽毛球運動傳入中國大約在十九世紀初，最初僅在天津、北京、上海、廣州等沿海大城市的基督教青年會中進行，透過青年會的開展，一些大城市的學校也開展這項活動（註16）。

其他運動項目如田徑、網球、足球、乒乓球、體操等項目，大都透過基督教青年會的傳播，而逐漸成為中國運動競技的主導項目。

2. 舉辦演講宣揚西洋體育

曾任職上海青年會幹事的麥可樂(Charles Harold McCloy 1886~1959) 在華期間相當活躍，經常在滬寧一帶的學校和體育團體中，進行有關西洋體育的演說，宣傳體育救國的理論。有一次他對學校演講時認為，體育教育須多注重適宜的球戲和運動，應該包含許多個人的自由在內。他反對兵式體操，因為其專制式的教材違背德謨克拉西（民主）的精神。他分析如果一個學校之內，只有選手運動，並無普及運動，就難培養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在一種最高尚的德謨克拉西之中，個人求個人利益，一定要有競爭，但這種競爭不可包含仇視的意義。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也是一種服務的精神，並不是一種貪得的精神（註17）。由於麥可樂(McCloy)不懈怠的四處奔走演講，宣揚他對西洋體育的理念，使西洋體育傳播與推展更加迅速，自然體育逐漸在學校體育趨於主導，取代兵式體操。

3. 創辦體育雜誌與出版體育圖書

早期的基督教青年會並無體育專業刊物，僅在青年會所辦的綜合性刊物中闢有體育專欄，如「青年進步」、「同工」、「上海青年」、「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等雜誌，報導體育消息或體育專論文章（註18）。當時頗多著名的體育家，如麥可樂(McCloy)曾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發表「體育教練」（註19）一文，在「青年進步」發表了「新體育觀」（註20）、「教育計劃中鼓勵競賽的必要」（註21）、「我對於這一次開遠東運動會底希望」（註22）等文章，提供當時傳入中國的體育新知。另一種體育刊物屬專業性體育雜誌，如天津青年會所創辦「體育周報」

(註23)，郝更生在那刊發表「國難中體育會議之召集」(註24)，謝似顏的「評大公報七日社評」(註25)，王健吾的「用科學說明中國學術的神祕」(註26)及「運動會的哲學」(註27)，為當時洋土體育論爭代表性的文章。上海青年會體育幹事所創辦的「體育季刊」(註28)，探討體育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傳播各項體育運動的基礎知識、運動方法及裁判規則等，對當時體育傳播有一定的影響。

(二)運動組織的建立與運動競賽的舉辦

1.青年會體育行政組織

在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和各地城市青年會中均設有體育部，專門負責安排青年會系統的體育工作。各地青年會可依其本身特性發展體育事業，而由全國協會體育部加以視導協助，如欲推展重大決策時，則由全國協會召開幹事會議，決定計劃，然後各城市青年會配合推動(註29)。青年會所設的專職體育部門，加上其他各部門相互協調建立共識，對體育的推展更有效、迅速。

2.社會體育團體組織的成立

(1)北京體育競進會與華北體育聯合會

1912年在北京廣甸舉行一次田徑運動會，與會者趁機發起「北京體育競進會」的組織，緊接著一些體育界人士便發起舉辦第一屆華北運動會的籌備，在1913年即以「北京體育競進會」為基礎，聯合各單位於5月24日在北京天壇舉行了第一屆華北運動會。各校為進一步加強聯繫，於1914年仍由北京體育競進會於5月19日至20日在天壇舉行第二屆華北運動會，參加單位約20個，項目除田徑外還增設籃、足、排、網、棒球等5個球類項目。賽會期間各單位派代表召開代表大會，在大會上通過了會章，推出負責人，隨即成立「華北體育聯合會」(註30)。其組織在青年會的協助下成立，其主要工作亦由青年會體育幹事負責推動，使華北運動會成為中國舉辦屆次最多的大型運動會。

(2)中華業餘運動聯合會

1921年6月4日，中國參加第五屆遠東運動會各機關的代表，在上海集會，與會共有49人，因時間短促，來不及逐條討論，各代表只得選舉臨時職員共9人。1922年4月3日下午，在北京青年會的會所，召開中華業餘運動聯合會正式成立大會，並且又議決5月在武漢或南京，舉辦一次全國運動競賽大會，做提倡統一的發軔。實際整個會務工作多由基督教青

年會外國體育幹事主持，因而中國參加第六屆遠東運動會時還選派葛雷(Gray)為總領隊(註31)。

3. 運動競賽的舉辦與協助

(1) 青年會與全國運動會

1910年10月在南京舉行的第一屆全國運動會，是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發起舉辦，並由該會美籍體育幹事愛克斯納(M.J.Exner)負責主其事。1914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屆全國運動會，名義上是北京體育競進會主辦，實際主持人是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美籍體育幹事候格藍德(A.N. Hoagland)。這兩屆全國運動會中的主要工作人員和裁判，大多為外籍教士充任，文件、佈告以及運動會秩序冊，均為英文刊印，報告和裁判用語，也一概採用英語(註32)。可見基督教青年會在當時推展西洋體育所扮演的角色。

(2) 青年會與遠東運動會

遠東運動會主要領導人是美國青年會布朗(E.S.Brown)，原在美國芝加哥、鹽湖城等地青年會任體育幹，1910年被派遣至菲律賓，任菲律賓業餘運動協會會長。布朗於1911年9月前往中日兩國活動，籌備遠東地區體育組織，爭取中國、日本加入該組織。1912年，以布朗(E.S.Brow)、德蘇萊(William Tutherly)克朗(F.L.Crone)組成三人委員會，遂成立遠東奧委會，1913年在馬尼拉召開第一屆遠東運動會，成立之初並未與國際奧委會取得聯繫，直到1920年才得其承認，更名為遠東體育協會(註33)。

歷屆出席遠東運動會，中國多由全國青年會體育幹事主其事，如出席第一、三、四、六諸屆及主辦第二、五兩屆均由美人克拉克(J.H.Crocker)、麥可樂(McCloy)、葛雷(Gray)等人主其事(註34)。

(三) 體育人才與體育師資的培養

隨著青年會的擴展，幹事逐年增加，全國基督教青年會於1921年舉辦第一屆體育幹事訓練班，凡青年會體育幹事及教會學校的體育教師均可報名，參加者共有各城市青年會和教會學校體育教師15人。由全國協會體育幹事葛雷(Gray)和上海青年會的體育幹事史溫(Swan)擔任組織教學工作(註35)，教學的內容，除一般體育理論及各項運動的比賽規則之外，還訓練游泳、籃球、排球、體操、遊戲及室內運動項目，如單槓、雙槓、木馬、跳高及立定跳遠等(註36)。

青年會除在中國培訓體育人才之外，還曾選送各市青年會推薦的體育幹事前往美國留學進修，學習青年會會務。中國青年會幹事曾前往美國春田體育學院深造的有：郝伯陽、郝更生、馬約翰、董守義、劉雪松、許民輝、高錫威和梁兆安等，前往考查學習的有田信耕和黃漢新等（註37）。青年會所培訓的這批人才，對以後中國體育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叁、本土體育之興起

西方體育到了清末，已經在大中城市的部份學校裏有所發展；軍隊中也施行由西方傳進的兵式體操。但在廣大城鄉的人民群眾中，仍以本土民俗活動為主（註38）。中國文化在清末民初面臨重大的衝擊，本土文化在軍事、政治、和經濟的壓力之下，即令在表面看來臣服了，平靜無事，可是在實際上於其文化的潛力裏卻正滋生不同的「地下活動」。中國近代政治性的群眾運動常與「江湖」或「下層社會」發生某種關聯。這種活動，蘊積既久，一方面可形之於仇視外來文化，另一方面可能爆發為排外運動（註39）。因此本土傳統體育活動的興起，有其內外因素，在此將之歸納如下：一、強國強種思想的刺激；二、西洋體育的衝擊；三、本土體育之提倡。

一、強國強種思想的刺激

清末內外紛擾不斷，國窮民弱，幾乎國不成國，處在被瓜分狀態中，國際地位遠不如殖民地，有識之士，相繼提出救國圖存的主張，如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提及：

「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懦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講。」

梁氏臚列出公德、進取冒險、尚武等十六項，均在發揚個人的能力，以達成國家的富強（註40）。

為達成強國強種，富國強民的願望，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今日教育之方針」一文，揭露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最大缺點在於偏重學生腦部的教育，而疏失於學生身體的鍛煉。他在文中述及：

之遺憾。「吾國曾受教育之青年，手無搏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白面纖腰，嫵媚若處子，畏寒卻熱，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國民，將何以任重致遠乎？」（註41）。

他認為應該智德體三者並重，使學生都能成為「意志頑狠」，體魄強健的新青年。

二、西洋體育的衝擊

從反抗外國侵略的角度看，中華武術蘊育了中華民族的愛國精神，基於民族情感它塑造出中華民族剛強不屈，同不良勢力進行鬥爭的勇敢精神。當他同民族精神融為一體時，武術文化便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環境和內在動力，成為中華武術發展以至民族發展的強大凝聚力。當武術文化把愛國主義當作它精神的最高層次時，它就同傳統文化的其它精神融匯起來，反過來促進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註42）。由此觀之，新文化運動前正是中國面臨西方瓜分和內亂紛擾時期，此時武術團體的成立，具有特殊的意義。武術組織由於受到西洋體育的衝擊，已展現不同的宗旨、組織形式、推展方式等，已漸漸由傳統走向現代的趨勢，因此以下將探討武術受衝擊之各個層面。

精武體育會於1910年創建於上海，由於上海是中國對外的門戶，為中西文化交流匯合之處。因此，精武體育會深受西洋文化的感染，其會務擴展迅速且遠及東南亞，以該會為例最具代表性。

（一）宗旨

精武體育會其宗旨在於闡揚「愛國、修身、正義、助人」的精神，還定了十條「精武式」規範會員的行為。「精武會訓」規定「凡我會員必須以仁愛為懷，服務為旨，以我所有助人所無，犧牲個人之力量，以求造福於人群；忠信待人，廉正守己，見義勇為，積功於天爵；重振風教，多行而寡言，稟遵斯旨，庶幾完人。」並以三星旗為會旗，鼓勵炎黃子孫，應以體、智、德「三育修身」，強國強身，振興中華，尤以盾牌為會章，強調練武者，重於保身衛國，必不輕言攻擊無辜，而對愛國精神之激勵，則以會歌相勉，精武會歌是：

國不強兮報毀滅，人不強兮難自立

振奮精神，鍛我筋骨，充我知能，堅我魄力。

百鍊此身如鋼鐵，任何威武不能屈！

大家齊步伐，勵行三達德。

起民疲！培國脈！

大家齊努力，發揚「精武式」，衛黃魂！盡天職！（註43）。

基督教青年會標榜的宗旨：要以基督教的精神，發展青年的德、智、體三育（後來增加群育）服務社會、造福社會、改造社會，使之成為基督化的社會（註44）。由此可見基督教青年會的宗旨，深遠影響到中國武術團體的宗旨。

（二）組織

西洋體育傳入後，除農村舊有的拳場之外，城市中許多新的武術團體紛紛改習西洋體育的組織，如精武體育會還製定「中國精武體育會章程」，精武總會總部設會長一人，副會長兩人，董事若干，總務主任兩人及辦事員若干人；在總部領導下，設技擊、兵操、文事、游藝四部，每部設部長一人，主任、教授若干人。各地精武體育會分會的組織機構略有不同，一般是在正、副會長和董事長下設立參事會，參事會下設總務等八科（註45）。

在精武體育會這類的武術組織中，一般皆有明確的宗旨，定有章程與機構，會務人員由全體會員選舉或是推薦產生，擺脫私人授業和事師如父的傳統觀念。通常是採集體教授的形式，會員大多是業餘參加，民國以來，城市中的武術會館能夠延續到1930年以後的，大多擺脫舊式武館的影響，按照西洋體育的組織形式加以改良而成的（註46），這是西洋體育對傳統武術所造成衝擊之一。

（三）教學方法

傳統武術長期一直以口傳身教，多採用個別輔導與單獨練習的單人教練方式，造成在學校或是軍隊中教學不易，因此對武術教學方法進行改良，以適應武術教學發展的需要。根據學校教學法的特點，北京體育研究社「乃查照體操教練規格，訂定團體教學之法」（註47）。參考研究西洋體育教學的一些基本原則，改革傳統武術的教學方法，以適應武術授課的集體練習。

三、本土體育之提倡

（一）有關本土體育法規之制訂

在軍國民教育方興之際，1915年召開的全國教育聯合會，議決軍國民教育施行方案中，明定：「各學校應添授中國舊有武技」，另有「各學校教科書，宜揭舉古今尚武之人物」，以及「各學校應表彰歷代武士

之遺像，隨時講述其功績」（註48）。1919年11月，教育部在京召開中學校長會議，議決通過：「請全國中學一律添習武術」案，此案原意與當時盛倡軍國民教育有關，可顯示學校體育徒以體操為主課，不如提倡中國武術，不僅可鍛鍊身體，並有養成自衛能力，意義重大（註49）。之後，北洋政府的國會還通過將「新武術」定為全國學界必學之「中國式體操」的決議（註50）。

（二）民間的提倡

清末多位革命黨人與體育有密切關係，如秋瑾、徐錫麟提倡體育與軍事相結合（註51），國民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先生（1866~1925）雖受西式教育，但對中國武術仍然十分堅定與執著（註52），精武體育會組織龐大發展迅速，孫文為該會撰寫序文，在「精武本紀序」強調：

「自火器輸入中國之後，國人多棄體育之技擊術而不講，馴至社會個人積弱愈甚，不知最後五分鐘之決勝，常在面前五尺之地短兵相接之時。為今次歐戰所屢見者，則謂技擊與鎗炮、飛機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國人曩昔，僅襲得他人物質文明之粗末，遂自棄其本體固有之技能，……吾人初不以黷武善戰策我同胞，然處競爭劇烈之時代，不之求自衛之道，則不適用於生存」（註53）。

王庚畢生提倡國粹體育不遺餘力，其所撰「五種運動法概論」，分析練習器械運動容易使身體發展不平均，練習時往往發生危險甚至受傷。並認為凡是中等學校以上的求學青年們，運動這件事，不應再聽命於學校時間表上的體操一科了；應該自己去尋一種運動，每日練習以為健身的工具，並強調中國的國粹體育中的「拳術」是最好的一種運動，其所持的理由為：1.各國體育有各國的精華和特色，非外人所易得同一效果的；且有人種、天性、環境等各國不同，不能同一提倡。中國拳術從古至今，相傳已數千年，有其極大的價值。2.拳術無論天晴陰雨，室內外地方大小，不分時間、老幼、男女皆可習此運動。3.拳術沒有危險發生，且練習時精神集中在運動；不若上體操課時，學生口中呼唱，手足動作，但自己都忘記其「所以然」了。4.拳術可作為保衛自己的工具。5.練習拳術可以去除一些身體疾病。6.拳術運動是「自動的體育」，是自然的動作，是民主而非專制的（註54）。

肆、新舊與動靜體育之爭

近百年來，由於西風東漸的影響，中國已由「天朝」意象轉為「師夷制夷」之說，經洋務運動到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這些主張或學說，其基本無非是求國家自保，因而當時體育在諸多理念影響下，亦肩負此一重要任務。但西洋體育之目的並非只求「強國強種」，而是還有其他使命，由於歷史條件的影響下，「體育」概念因時空之變異，呈現不同之風貌，由以下探討可略窺一二。

一、體育概念之差異

據載「體育」一詞，是在1897年引入中國並見於時人文章中，當時作者只是簡單、含糊的把「體育」解釋為「體育者，衛生之事也」，1903年清廷官方文獻有「體育」用語之名稱，仍不離衛生保健的範圍，隨後因內外局勢的影響，明訂體操為學校課程科目之一，並相繼以兵式體操為主，謀求強國強兵之道（註55），而1909年蔣維喬發表「論學堂輕視體育之非」一文，以學校教育非僅於知識教育，身體務使之均衡發達，以造就健全之國民，「體育亦非專養尚武精神之謂」（註56）。

徐一冰曾留學日本接受體育專業訓練，回國創辦中國體操學校於滬江，1914年正值軍國民教育風起雲湧之時，向教育部逕陳有關改革學校體育之見，強調提倡「正當體育」，徐一冰說：

「考察各省學校體操一科，非視為具文，即偏重軍事。至所謂正當之體操，仍有視為無足輕重者……體操一科與生理學、心理學有密切關係。斷非無教育無知識之一二兵士可以能勝任也。……」

徐氏認為小學校中學校體操及遊技宜統一選擇適當之教材，支配課程，編定專書，否則「授以兵式體操者有之，中學校學生，專以少數人之踢球賽跑為體操者有之」。徐一冰反對兵式體操為學校體育一門，當時教授此兵式一科，非退伍兵士，即為軍中品行不端或文字不知。徐氏對本土體育的武術評價甚高，高等小學中學師範亟應添習本國技擊一門，他認為：

「我國技擊為高尚之運動，惟以練習艱苦，工夫深遠，文弱者流，輒鄙夷視之，實行之於學校，即為我國最古最良之體操術，能穩步武，能固筋肉，手足之靈敏，全身之堅強，較之東西洋之所謂高等體操術，有過之而無不及也。」（註57）。

同年，徐氏又於教育雜誌，發表「論學校體育」，除論及學校體育不外衛生、運動二者，並再次主張選擇體操遊技之教材，支配體操遊技之時間，循序漸進，以收體育之實效。徐沉痛指責體育之流弊，徐氏以爲：

「民國以來，教育部曾有尙武精神之訓令矣，一般教育家亦嘗有提倡軍國民教育之意見矣。然而尙武精神云云，均一空闊無邊，浮而不實之渾稱也。至究其方法如何，施行如何，及如何而始有實效，如何而可得良果，又何嘗有確實之研究，以示進行之方針耶。」

(註58)

徐一冰說：「我知之矣，彼執教育行政，及主持教育者，要亦鑑於東西洋之注重學校體育，以及教育原理之智德體三育之不可缺一，所謂人云亦云而已乎」(註59)，由於歐戰方興，兵式體操大受歡迎，體育自難有容身之處。

當時雖軍國主義盛行，影響所及，政府教育當局亦提倡軍國教育，兵式體操是學校體育課程的主要內容，但仍有很多知識份子，指出兵式體操之弊病，對體育的意義、本質、價值、功能提出論述，如1913年太玄：「歐美體育界之新傾向」(註60)，1914年候鴻鑑：「參觀蘇省聯合運動會感言」(註61)，1915年錢智修譯述柯樂克之演講：「體育之講義」(註62)，1915年朱元善：「體育之價值」(註63)，1915年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註64)及1920年之「青年體育問題」(註65)，1919年二十八畫生：「體育之研究」(註66)等，對體育之概念有引導作用。

新文化運動時期，「民主」與「科學」呼聲響徹雲霄，加上1919年歐戰結束後，主張軍國主義的德國慘敗，平民思想及實用主義抬頭，專斷的軍國民教育思想趨於衰落，單調乏味的兵式體操，難逃寞落的命運。來華傳播西洋體育的傳教士中尤以麥克樂最爲熱心提倡體育，隨後美國教育家孟祿等人，陸續到中國考察，對中國學制及課程提出改進之建議，清末以來一直延用「體操」爲名稱的科目，於1922年改名爲「體育」，並取消課程中的兵式體操。受新文化之激盪，思想趨於開放活躍，體育方面的論著較前爲多，對體育的概念見解更深入，(註67)。

清末引進西洋體育之後，在體制上，先模仿德、日系統，繼以英美系統爲體育改革之核心，體育思想之混亂於焉形成。義和團之後武術曾

被嚴加禁止，日俄戰爭鑑於日本之尚武，武術再度受到重視，歐戰後「兵操廢存」、「新、舊體育」之爭，導致體育觀念糾纏不清（註68）。因而1923年蔣湘清在「教育與人生」專刊第一期發表：「體育究竟是什麼？」一文，切中時弊的說：

「體育二字，我國向無確切之定義。拳教師，說學習拳術就是體育；運動家，說踢毬賽跑就是體育；丘八大爺，說兵式操就是體育；和尚道士，說修行靜坐就是體育。體育的解釋如此，社會上對於體育的觀念怎樣，也可想而知了。最可怪的，是那些無學識的體操教員，竟把他天天做的幾個呆板的沒趣的動作，一二三四的故技，也就算是體育了。難怪體育教員，被人瞧不起，我國的體育，不能普及，不能發達！」（註69）。

二、新、舊體育之爭

1915年，陳獨秀在其所創辦的「青年雜誌」發表「敬告青年」文中，首先提出：自主的、進步的、進取的、實利的、和科學的新精神，希望青年從奴隸的、保守的、退隱的、虛文的、和想像的舊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陳獨秀於新文化運動時期，公然反對孔子學說及以孔子學說為中心的舊家庭制度，舊倫理觀念，舊特權綱常制度和舊的「奴隸的道德」等等。胡適在「不老」一文中，提出要養成一種歡迎的新思想習慣，使新知識可以源源進來；極力提倡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佈下新思想的種子（註70）。魯迅言詞更激烈的說：「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歎氣」（註71），魯迅堅定認為：「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又說：「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註72），魯迅、陳獨秀等人對提倡「國粹體育」亦有諸多批判。

新文化運動興起後，馬良是皖系軍閥，經多年武術經驗，為適應軍隊團體教學，對傳統武術進行改造，自認為是中國之科學，而竭力鼓吹「國粹體育」，他編定一套「新武術」名稱為「中華新武術」，教材包括摔角、拳腳、棍術和劍術四科。他說：「考世界各國，武術體育之運用，未有愈於我中華之武術者。前庚子變時，民氣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隸之主動力，惜無自衛制人之術，反致自相殘害……是以決心考究我國數千年來武術，編定武術教科書，以振吾中華尚武之風」（註73）。馬良並企圖推行一種標誌各級官階身份，共三等九級的「佩劍制度」，以

發揚武德、武風（註74）。由於馬良對傳統武術進行整理工作，使武術在反傳統提倡科學聲浪中，載沈載浮免於遭受時代洪流煙滅，但未來武術的革新與發展，仍有一段崎嶇而漫長的道路。

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陳獨秀，對「國粹體育」的提倡者痛斥為迷信、封建、不科學，魯迅仍慣用諷刺的口語說：

「近來頗有許多人，在那裡提倡打拳。記得先前也曾有過一回；但那時提倡的，是滿清王公大臣；現在卻是民國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於他們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便不得而知。

現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傳與軒轅黃帝傳與尼姑』的老方法，改稱『新武術』，又稱『中國式體操』，叫青年去練習。聽說其中好處甚多，重要舉出兩種來，是：

一用在體育上 據說中國人學了外國體操，不見效驗，所以須改習本國式體操（即打拳）纔行。依我想來，兩手拿著外國銅鎚或木棍，把手腳左伸右伸的，大約於筋肉發達上，也應有點效驗，無如意不見效驗！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練『武松脫铐』那些把戲了。這或者因為中國人生理上與外國人不同的緣故。

二用在軍事上 中國人會打拳，外國人不會打拳。有一天見面對打，中國人得勝，是不消說的了。即使不把外國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陣『烏龍掃地』，也使一齊掃倒，從此不能爬地。無如現在打仗，總用槍砲。槍砲這件東西，中國雖然『古時也已見過』，可是此刻沒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練習；怎能禦得槍砲？我想！（他們不曾說明，這是我的『管窺蠡測』）打拳下去，總可達到『槍砲打不進』的程度。（即內功？）這件事，從前已經試過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算是名譽完全失敗了。且看這一回如何」（註75）。

隨後，有陳鐵生者反對魯迅的觀點，投書論述，魯迅再以「拳術與拳匪」加以辯駁，魯迅反對教育家過度宣揚武術的效用，恐再發生庚子年的「義和團」之變，他總結為：

「中國拳術若以為一種特別技藝，有幾個自己高興的人，自己在那裏投師練習，我是毫無可否的意見，因為這是小取譸現在所以反對的便在：(1)教育家都當作時髦東西，大有中國人非此不可之概(2)鼓吹的人，多帶著『鬼道』精神，極有危險的豫兆」（註76）。

陳獨秀對當時「國粹體育」與西洋體育看法是：「體育應有三戒：(1)兵式體操。(2)拳術。(3)比賽的劇烈運動。」，陳氏分析指出，軍國民的時代已成爲過去，而兵式體操是殺人思想，教育家不要再貫輸給青年人。他認爲庚子年的「拳匪」之亂使中國再次喪權辱國，而馬良所謂「中華新武術」只是邀集當時幾位知名拳家重新修編，不應將「神拳」納入學校體育教材的內容。陳氏對西洋體育的劇烈比賽活動，亦持反對的態度，認爲比賽的劇烈運動，於身體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至於助長競爭心、忌妒心、虛榮心更是他的特色。（註77）。陳氏的這番見解充份顯示武術仍須通過科學的考驗，中國對西洋體育的自然科學知識尙未認清，運動競賽之精神則一知半解，造成西洋體育發展之流弊。

綜上所述，傳統武術與西洋體育相較，由於西方科學較發達，西洋體育具有自然科學之基礎；另外西洋體育有完整的規則、組織、制度、裁判、場地，其強調是公平競爭之精神，而其所蘊含的是西方民主與社會管理科學之基礎。因此，在如此巨大的反傳統波浪聲中，武術仍披著神秘的外衣，尙未接受科學的洗理，但不可否認其社會化功能。傳統勢力在「保存國粹」的鼓噪聲中，亦令人聯想反民主的頑固作風，鼓吹提倡尊孔讀經，藉以抵制新文化運動，而強調提倡中國武術，未嘗不是抗拒西洋近代體育在中國發展。

三、動、靜體育之爭

在中國古代養生思想史上，動與靜是一對十分突出的範疇。古人已經意識到，沒有絕對的動，亦無絕對的靜，而是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或者外動內靜，或者外靜內動。中國古代養生思想的主動觀念來自於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模式，即如易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秦道家以「清靜」學說立論，即不僅蘊含人生論，亦直接包含其養生論。老子主張「致虛極，守靜篤」，「無欲以靜，天下將自定」，「清靜無爲天下正」，其中包含著他以靜爲個體養生治身的基本原則。莊子也認爲「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他認爲人體是「形勞不休則弊，精用不已則勞，勞則竭。」因此他認爲唯一正確養生之道是以靜養神。從先秦道家首開以靜養神、以靜養生的先聲後，立即在中國養生文化中激起了深遠的反應。佛教在修習行爲和宗教目標上都鮮明地表現出「靜」的文化色彩。佛教進入中國後，便在思維方式

和修煉行爲上和道家主靜理論一拍即合，輕易的進入中國養生思想體系中（註78）。

（一）「靜」體育之提倡

靜坐原屬中國古代導引術之一種，行之得當，可有一定健身、療病、益壽延年的作用。但在古代常與佛道的修真養性相聯繫，常攙雜一些傳統思想，在近代則多被一些「封建殘餘勢力」用來進行復辟和反對新文化的武器，抵制西洋體育的傳播。辛亥革命後，一些守舊人士又把「靜坐」拿出來，當作「國粹」來鼓吹提倡，具有排拒新文化運動的意謂。當時這方面著作不少，如：「因是子靜坐法」、「靜坐法續編」、「靜坐淺說」等，長沙「體育周報」曾連載關於「靜坐」的文章，以提倡所謂「靜」的體育（註79）。

本世紀初，任教習於北京大學的蔣維喬首先在該校提倡，且編創「因是子靜坐法」一書加以發表，書中內容為原理、方法、經驗三篇及附錄。「靜坐法」主要是以傳統之養生術為基礎，結合蔣氏個人經驗編纂而成，並刪除傳統養生術中摻雜的神密怪異部分，強調已受過近代科學洗禮，說明操作方法。該書發行後，相當暢銷，不到4年即再版14次，使「靜坐法」風靡一時（註80）。

據1920年長沙「體育周報」記載，提倡「靜坐」的湖南「同善社」，遍布18省，就連偏僻的小縣，差不多都有其分社。當時，教育界亦有不少人提倡「靜坐」，大學講師、學生，大都積極效法，而且有些學校把「靜坐」編入課程，大學生還組織「靜坐會」。來洋縣以教育會長為首，聯合多人發起組織「中外衛生會」，主要研究中國人靜坐養生的方法及外國人操練的方法（註81）。由於蔣維喬任教於北京大學，「靜坐」在該校亦相當流行，並組有「靜坐會」。由此觀之，當時「靜的體育」之流行可見一般。

蔣氏該書中，於序文提及「靜坐法」，是中國古時即有之功，修練可祛除疾病，無病者可為預防疾病之用。自後世失傳，習者大多是販夫走卒，或為道士所專用，於是蒙上神秘色彩，而官紳、讀書人皆不願論及。在西風東漸之時，蔣氏在喧囂時代強調國民性情浮動，以修習「靜坐」術拯救之，是一帖切中時弊的良藥（註82）。

原理篇，蔣氏引述儒家、老莊、佛家所言，強調靜坐在求身體重心之安定，並倡言靜坐對生理、心理之益處，蔣氏以為：

「靜坐之法，淺言之，乃凝集吾之心意，注於重心之一點，使之安定。行持既久，由勉強幾於自然，於是全身細胞，悉皆聽命，煩惱不生，悅懌無量。儒家之主靜，老氏之抱一，佛家之禪觀，命名各異，究其實，罔非求重心之安定而已。」（註83）。

本篇文最後有鄙視西洋體育之意，並倡言「靜坐法」之益處，能鍛鍊心志，達修養之功，尚有驅逐病魔之效，且論述形神之關係，如蔣氏所云：

「吾見世之體育家，鍛鍊筋骨，極其強固，一旦罹不測之病，莫之能禦，甚且廢人者有之。而禪師或哲學家，鍛鍊心意，能藉修養之作用，驅除病魔；雖驅體孱弱，而卒能壽及期頤者矣。可知精神之我，其能力有遠過於形骸之我者矣。靜坐之法，使重心安定，可以合形神為一致，而實則能以神役形。每日按時行之，毋使間斷，亦可名之為精神體操」（註84）。

蔣氏亦引用「身心合一」的體育觀點，談體育兩者皆不可偏廢，而體操和運動偏於身體的修養，應以「靜坐」達成精神修養，其觀點為：「體操和運動，雖然可以強健筋肉，活動血脈，實在他的效驗，不過偏於肉體罷了。至於精神，就不能顧到，所以於育字未必完全。依我見解，必須兼用修養功夫，方得完成此育字的意義。有人說身體強健，精神也自然隨之而強，正不必分作兩截。這話我卻不敢贊同。須知道身體和精神，一主用動的修養，一主用靜的修養，偏於一方面，是不可的。」（註85）

另外，黃醒為長沙「體育周報」創辦人，他亦提倡「靜」的體育。1919年發表「為甚麼提倡靜的體育？」一文，所持的理由為：提倡「靜」的體育的第一個目的，便是要使腦筋清醒。黃氏覺得當時提倡運動的體育家，有十分之六的頭腦簡單的。所以他認為以運動儲蓄腦力，而使腦筋流於簡單，不如清醒運動員那太複雜太昏迷的頭腦。他認為提倡「靜」的體育，主要在去除人們的「忿氣」與「慾念」，一個人去了忿慾，頭腦自然清醒（註86）。黃氏另一觀點，要想使各方領袖熱心提倡體育，必須使他們生感情，而生感情必須破除舊習慣，必須有清醒的頭腦，因此黃氏要竭力提倡「靜」的體育（註87）。

1920年前後，正是「靜坐」最流行和討論最熱烈之時，黃氏積多年修練「靜坐」去除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的經驗，發表「我的靜坐觀」連

載於「體育周報」，他認為「靜坐是一種體格修練的運動」，其所持的理由有四點：1.靜坐術最重姿勢，人體當姿勢凝重的時候，各部大肌肉必然緊張；體育運動的作用，就是使疲勞或緩弛的肌肉緊張。靜坐術利用肌肉緊張，促進肌肉細胞的新陳代謝。2.靜坐術最重呼吸，靜坐時呼吸深長，血液循環的量必然增加，血行也隨之旺盛；運動時也是促進血液循環的旺盛。3.靜坐術忌閉眼、忌睡著，主要在於使肌肉緊張，使血流迅速，以便增加體內新陳代謝作用（註88）。4.習靜坐可治好生理疾病，可使頭腦清楚，排除浮動的雜念。黃醒並痛責當時靜坐之時弊，修習靜坐者，應講究道德修養，應該頭腦清醒，應該節慾（註89）。

素來提倡中國拳術的王庚，於1923年發表「體育的原理和運動的方法」文章中，提及靜坐時雖然身體不動，但對於深呼吸很有關係，所以也列入運動種類中，世人稱之為「靜的體育」；王氏亦認為一個人的「志氣」和「勇力」中，每含有「慾念」和「忿氣」，而「靜的體育」便是「懲忿窒慾」；並強調儒家的浩然之氣，釋家的禪定之功與道家的守神無卻，說明靜坐與傳統文化之不可分割的關係（註90）。

綜合上述所論，蔣維喬之「因是子靜坐法」，黃醒之「靜的體育」觀，王庚的「靜坐觀」等，可謂一脈相傳。其「靜」體育思想皆源自於儒家、道家、佛家，而三家皆偏於「靜」的體育，儒家主靜不盲動，佛家之禪師或道家之哲學家，藉「靜坐」鍛鍊精神，有身心修養之作用，並祛除生理、心理疾病之效，認為靜坐可使形神合一，身心不可偏廢，且頭腦清醒，去除「忿氣」與「慾念」，靜坐方法尤重身體的姿勢，精神的集中，呼吸的練習。因此，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鼓吹「靜」的體育，對西洋體育推展有抵制作用。

（二）主「動」反「靜」之體育

在新文化運動進行方酣之際，反對靜坐者則認為「天地蓋惟有動而已」，批判其「靜的體育」的主張。認為人是動物的一種，應該愛好運動，並謂「體育之效，至於強筋骨，因而增知識，因而調感情，因而強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識、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適，是謂俱泰。故夫體育非他，養乎吾生、樂乎吾心而已。」對「靜坐法」倡導者提出「靜坐之法，為朱陸之徒咸尊之。近有因是子者，自詡其法之神，而鄙運動者之自損其體。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且以「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

魄；苟野蠻其體魄，則文明之精神隨之。」並明確表達對身心的觀點，「肢體纖小者舉止輕浮，膚理緩馳者心意柔鈍，身體之影響於心理也如是」（註91）。魯迅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三十三」中揭露，那些鼓吹「靜坐」的人，「先把科學東拉西扯，羈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註92）。

由1920年的一篇文章，多少可瞭解當時「靜坐」的風行，文章中指出：

「民國以來，於今也有八年，甚麼教育、實業、政治，絲毫沒有長進，甚且一年不及一年……獨有兩樣事情，我國民的程度可是長進了，第一樣是撲克，第二樣是靜坐，我國男女老少，除了正正當當的勞工不計外，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內行」（註93）。

因此，有人就提出「闢靜坐」來反駁提倡者的觀點，以社會科學的眼光來鑑定「靜坐」的原理及效果，並以印度為佛教發源地被英國所滅，沉信奉佛教的梁武帝死於臺城為例，作者最後痛責道：

「靜坐最大的害處，就是使人趨於消極，我們一天一天的習靜，清心寡欲，就一天天把進取雄心磨滅了，就把一個『厭世而不自殺的悲觀主義』，代替了『愛世努力的改造主義』。這樣子的靜坐，即令能卻病，能延年，也不過替我們中國多造一些人類的寄生蟲和社會的蝥賊，這些寄生蟲和蝥賊，早些死了也是於社會造福，要活了幹什麼？佛教最講靜坐，印度為佛教發生地，免不了為英國所滅，梁武帝為中國最信佛教的一人，免不了臺城一死，各位先生想做梁武帝，何必定要把中國弄成印度呢？」（註94）。

在當時國內軍閥混戰，國外列強脅迫壓榨下，傳統社會思想仍盛行之際，提倡靜坐，不免使人聯想到老莊企圖神仙的清談思想，佛家靜心潛修之歸隱山林，皆遁世的消極觀念。

伍、結論

本研究經以上之分析、探討後，得知清末民初是中國歷史最重要的轉折期，由於西方的挑戰、衝擊，中國短瞬間窮於回應，造成內在調適失衡，而體育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因素載沉載浮。經過以上各點之文獻分析、批判，可獲致下列結，以回應本研究所設定之目的：

一、西洋體育傳入的媒介因素甚多，但以傳播層面和影響程度而言，當推教會學校和基督教青年會，尤以基督教青年會引進與宣揚西洋體育

不遺餘力，透過青年會體育行政組織藉以推動社會體育團體組織的成立，而早期全國運動會的舉辦與遠東運動的參賽，端賴青年會才能克竟全功，而後來中國體育人才與師資培訓多出自於青年會，使西洋體育成爲中國近代體育流派消長的生力軍。

二、本土體育之興起可歸因於清末國困民窮之苦，進而企求強國強種之思想，又受到西洋體育的衝擊，本土體育爲代表之武術團體紛紛成立，在「師夷制夷」的策略下，吸收西洋精神並融合傳統文化爲宗旨，本土武術組織與教學方法皆與時代並進，加上因官方與民間的提倡，本土體育得以繼續傳衍。

三、清末民初，西洋體育傳進中國，先以德、日兵式體操爲模仿對象，繼之以英、美體育系統爲改革核心，加上原有傳統之本土體育，因而在東施效顰與保存「國粹體育」聲中，導致體育概念混淆不清。縱觀新舊與動靜體育之爭，皆在誇己之長貶他人之短，由論爭可瞭解本土體育朝科學方向改進，在西洋體育的競爭刺激下，重新整理本土體育的內容，並試圖付與新意義；西洋體育則在生搬硬抄的移植下，仍難適應中國文化特色與民族性。因此，吸收西洋體育精華，融會本土體育之文化特色，以發展有中國體育特色之道路，仍爲今後研究之課題。

註 釋

註1：李方晨 中國近代史 台北 三民書局 1968 pp.182~278。

註2：中國近代史教學研討會主編 中國近代史 台北 幼獅書局 1967 pp.12~16。

註3：蕭一山 中國近代史概要 台北 三民書局 1967 pp.236~239。

註4：周西寬 體育運動史 北京 人民體育出版社 pp.342~343。

註5：許義雄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體育思想之形成 體育學報第九輯 台北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1987 pp.1~6。

註6：韋政通 中國文化概論 台北 水牛出版社 1991 pp.2~8。

註7：張岱年等 中國文化與文化論爭 台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0 p.4。

註8：蘇雄飛 五四運動前後我國體育的發展 體育學報第七輯 台北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1985 p.69。

- 註9：董守義 華北體育聯合會的沿革 中國體育史參考資料第三輯 下
北京 人民體育出版社 1958 p.99。
- 註10：何啓君 中國近代體育史 北京 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 1990 pp.
64~65。
- 註11：聶嘯虎 早期基督教青年會與中國近代體育的社會化趨勢體育史
論文集(二) 北京 中國體育史學會 1986 p.71。
- 註12：王宜舟 奈史密斯與籃球運動 體育文史1985第4期 北京 人
民體育出版社 1985 p.51。
- 註13：董爾智 對籃球運動傳入中國的一點考證 體育史論文集(三) 北
京 中國體育史學會 1987 pp.145~146。
- 註14：于建勇 中國首批留學生與他們的體育活動 體育文史1990第1期
北京 體育文史雜誌社 p.48。
- 註15：同註10 p.443。
- 註16：梁小牧 漫話羽毛球運動 體育文史1985第3期 北京 體育文
史雜誌社 1985 p.33。
- 註17：麥可樂 體育與德謨克拉西 體育與衛生第三卷第一期 上海
中華全國體育研究社 1924 pp.2~5。
- 註18：聶嘯虎 早期基督教青年會與中國近代體育的社會化趨勢體育史
論文集(二) 北京 中國體育史學會 1986 p.74。
- 註19：麥可樂 體育教練 上海 中華基督教年鑑 1921 pp.96~98
- 註20：麥可樂 新體育觀 上海 青年進步雜誌第36冊 1920 pp.13~38。
- 註21：麥可樂 教育計劃中鼓勵競賽的必要 上海 青年進步雜誌第40
冊 1921 pp.61~67。
- 註22：麥可樂 我對於這一次開遠東運動會底希望 上海 青年進步雜
誌第42冊 1921 pp.1~3。
- 註23：天津「體育周報」 天津青年會於1932年2月6日創辦該刊物，是
當時相當著名的體育專業刊物，對運動比賽消息的報導，運動方
法的介紹，體育理論與觀念的探討均有涉及，而當時多篇關於洋
土體育論爭的文章，本篇論文亦加以蒐集論述。
- 註24：郝更生 國難中體育會議之召集 天津 體育周報第二十二期
1932 pp.7~8。

- 註25：謝似顏 評大公報七日社評 天津 體育周報第三十期 1932
pp.1~4。
- 註26：王健吾 用科學說明中國拳術的神秘 天津 體育周報第二卷第
十二期 1933 pp.6~7。
- 註27：王健吾 運動會的哲學（一~五） 天津 體育周報第一卷第四
十五期至第二卷第十五期 1932~1933。
- 註28：體育季刊 麥可樂主編 中華全國體育研究會出版 上海 上海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該季刊因麥氏回美後即停刊。
- 註29：蔡政杰 基督教青年會與近代中國體育之發展（1895~1928）台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2 p.84。
- 註30：董守義 華北體育聯合會的沿革 中國體育史參考資料第三輯
北京 人民體育出版社 1958 pp.100~101。
- 註31：古世權 中華業餘運動聯合會成立前後 體育文史1991年第2期
北京 體育文史雜誌社 1991 pp.39~41。
- 註32：丁非杰 對舊中國全國運動大會之我見 體育文史1988年第5期
體育文史雜誌社 1988 p.33。
- 註33：施禮康 遠東運動會與近代中國體育的發展 中國體育史論文集
（五）北京 中國體育史學會 1989 p.247。
- 註34：同註29 pp.91~92。
- 註35：馮公智 步慕芳 基督教青年會與中國近代體育的關係 體育文
史1985年第6期 北京 體育文史雜誌社 p.5。
- 註36：儲劍虹 再談青年會所辦體育師資訓練機構的名稱問題 體育文
史1989年5期 北京 體育文史雜誌社 1989 p.36。
- 註37：同註35 p.6。
- 註38：同註10 p.56。
- 註39：殷海光 中國文化的展望（上） 台北 桂冠圖書公司 1990 p.69。
- 註40：許義雄 晚清體育思想之形成 體育學報第十輯 台北 中華民
國體育學會 1988 p.2。
- 註41：陳獨秀 今日之教育方針 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二號 上海 群益
書社 1915 pp.128~132。
- 註42：劉雪松 試論武術精神及其對民族精神的塑造 北京 北京體育
學院出版社 1990 p.182。

- 註43：余碧玉 精武體育會之研究 (1910~1928) 桃園 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2 p.136。
- 註44：同註35 p.4~5。
- 註45：吳志濱 民國成立至抗戰前國術團體組織與教學發展史實研究桃園 國立體育學院體研所碩士論文 1991 pp.30~31。
- 註46：同註43 pp.143。
- 註47：吳緒 北京體育研究社與近代中國武術的發展 體育文史1990年6期 北京 體育文史雜誌社 1990 p.36。
- 註48：陳蔭生 中國近代體育議決案選編 體育史料第16輯 北京 人民體育出版社 1990 pp.5~6。
- 註49：吳文忠 中國武術發展簡史 中國武術史料集刊第二集 台北教育部體育司編印 1975 p.2。
- 註50：古世權 中國體育史 北京 北京體育學院 1981 p.322。
- 註51：吳文忠 體育史 台北 正中書局 1982 pp.322~323。
- 註52：同註43 p.43。
- 註53：孫文 精武本紀序 上海 中央精武體育會 1919 p.1。
- 註54：王庚 五種運動法概論 上海 時事報婁乃第三、四版 1992。
- 註55：原載「神州日報」戊申六月初四 轉載於東方雜誌第五卷第六期 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08 pp.99~101。
- 註56：蔣維喬 論學堂輕視體育之非 教育雜誌第一卷第六期 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 1909 pp.76~78。
- 註57：徐一冰 整頓全國學校體育上教育部文 體育雜誌第二期 上海中國體操學校 1914 p.1~4。
- 註58：徐一冰 論學校體育 教育雜誌第六卷第十號 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4 p.189。
- 註59：同上註。
- 註60：太玄 歐美體育界之新傾向 教育雜誌第五卷第七號 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3。
- 註61：候鴻鑑 參觀蘇省聯合運動會感言 教育雜誌第六卷第十號 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4。
- 註62：錢智修 體育講義(一)、(二)、(三)教育雜誌第七卷第一~四號 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5。

- 註63：朱元善 體育之價值 教育雜誌第七卷第十一號 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5。
- 註64：陳獨秀 今日教育方針 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二號 上海 群益書社 1915。
- 註65：陳獨秀 青年體育問題 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 上海 群益書社 1920。
- 註66：二十八畫生 體育之研究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 上海 群益書社 1919。
- 註67：許義雄 中國近代體育概念之形成 台灣體育雙月刊 台中 台灣體育雜誌社 1990 p.27。
- 註68：許義雄 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體育思想之特質 體育學報第十二輯 台北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1990 pp.7~8。
- 註69：蔣湘青 體育究竟是什麼？ 教育與人生第一期 上海 申報副刊第一版 1923。
- 註70：林一新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六集五四運動 聯經出版公司 1981 p.22。
- 註71：魯迅 隨感錄三十五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 上海 群益書社 1918 p.565。
- 註72：魯迅 魯迅警語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2 p.169。
- 註73：馬良 中華新武術發起總說 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 pp.1~3
- 註74：成都體育學院體育史研究至編著 中國近代體育史簡編 北京 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 1981 p.78。
- 註75：魯迅 隨感錄三十七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 上海 群益書社 1918 pp.566~567。
- 註76：魯迅 拳匪與拳術 新青年第六卷第二期 上海 群益書社 1919 pp.241~244。
- 註77：陳獨秀 青年體育問題 新青年第七卷第二號 上海 群益書社 1920 p.319。
- 註78：郝勤 試論中國傳統養生思想中的動靜觀 體育文史1990年第2期 北京 體育文史雜誌社 1990 pp.54~56。
- 註79：同註50 p.324。
- 註80：同註10 p.132。

- 註81：同註10 p.132。
- 註82：因是子 因是子靜坐法 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9 pp.1~5。
- 註83：因是子 因是子靜坐法 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9 pp.4~11。
- 註84：同上註 pp.4~11。
- 註85：蔣維喬 我的體育觀 體育周報特刊第一號 長沙 體育周報社 1920 p.20。
- 註86：黃醒 爲甚麼提倡靜的體育？ 體育周報第十期 長沙 體育周報社 1919 pp.2~3。
- 註87：黃醒 爲甚麼提倡靜的體育？ 體育周報第十一期 長沙 體育周報社 1919 p.2~3。
- 註88：黃醒 我的靜坐觀 體育周報第五十一期 長沙 體育周報社 1920 pp.37~38。
- 註89：黃醒 我的靜坐觀 體育周報第五十二期 長沙 體育周報社 1920 pp.50~52。
- 註90：王庚 體育的原理和運動的方法 學生雜誌第十卷第四號 上海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3 pp.7~8。
- 註91：同註66 pp.166~168。
- 註92：同註74 p.79。
- 註93：毓瑩 闢靜坐 體育周報特刊第一號 長沙 體育周報社 1920 p.109。
- 註94：同上註 p.110~116。